

壮语音研究的回眸与进展(2013–2024)

——基于壮语声韵调系统的学术史考察

□ 蓝明生

自1924年刘策奇先生在《歌谣周刊》第54期上发表的《壮语之我见》一文算起,壮语研究已有百年历史。截至2012年底,以李方桂、袁家骅、吴宗济、张元生、张均如、韦庆稳、韦景云、覃晓航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在壮语声母的演变、特点、来源及方音对应,壮语元音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壮语元音的交替、壮语单元音复化的条件、壮语长短元音的性质,壮语声调演变和连读变调规律,壮语音系的调查及壮文方案的制定与修订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013年以来,壮语研究工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持续深化研究。为了方便人们了解2013—2024年壮语音研究的进展情况,本文将这一时期的研究进行概述。

一、声母的研究

声母的研究集中在声母的演变、来源及特征三个方面:

1.在声母的演变方面

朱玉柱总结出越是壮族聚居区且较少和其他少数民族或汉族杂居的地区,r音类整类演变的“纯度”越高,而越是民族成分复杂或者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或者远离壮语北部方言大本营的地区(如云南广南、广东连山),r音类整类演变的“纯度”越低的结论。(见《壮语北部方言r音类研究》一文,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蓝天孝发现律达村壮语辅音[pj]、[mj]变异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影响,其演变规律是:pj'pj/p'p,mj' mj/m' m,其变异的方向是向普通话辅音靠拢,腭化辅音[pj]、[mj]音节变少,非腭化辅音[p]、[m]音节变多。(见《壮语辅音pj,mj变异现象探析:以律达村壮语为个案》一文,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14年第6期)

韦景云认为原始台语声母*ʔb、*ʔd在板田壮语中演变为v、z,这种变异特征应是地缘及语言内部演变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见《板田壮语几个音变特征及其演化路径》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5年第5期)

黄静露指出,壮语的复辅音数量较多,形式较古,但也跳不出简化、消失的大趋势。壮语复辅音的演变过程既遵循语言由繁到简的简化规律,又颇具独特之处,存在音位自由变体和代际差异现象。其原因一是受语言发展简便、经济原则的支配,二是接受教育的条件和背景不同,三是语音发展的不平衡性、语音变化缓慢(见《贵港壮语复辅音的简化演变》一文,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她还认为横县壮语读书音是壮、汉语言接触的产物,其声母系统同时保留了中古汉语和本地壮语的语音特点,但又与中古汉语存在语音差异,这些差异是横县壮语读书音声母系统自身发展和壮语等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见《基于壮、汉语言接触的壮语读书音声母系统研究:以广西横县为例》一文,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

张文萱解释了宜州德胜壮语ɬ音的存在及s音和ɬ音共存的原因:与汉语的接触有关。(见《宜州德胜壮语-s母的特殊音变探讨》一文,载于《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潘红交认为壮语复辅音声母的演变路径基本上遵循侗台语复辅音声母由“复辅音→腭化音→单辅音”逐步简化的特点,其分化和演变过程除了受到行政地理、交通地理、自然地理等语言大环境下的外部因素影响,还受到诸如语言经济性原则的抑制、语音系统内部的制约、发音部位周边化的演变趋势、语言的渐变性影响等内部演变因素的共同作用(见《壮语复辅音声母地理共时分布及演变》一文,(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她还在《仙湖壮语声母屈折形态变化研究》(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声母屈折是仙湖壮语的一种造词方式,仙湖壮语声母屈折的规律与其发音部位、发音方法、语义关系等相关,侗台语声母屈折形态构词演变特点可能与各自方言音系结构的不同相关,仙湖壮语声母屈折是语言经济原则使然。

赵先进找到了浪砚话塞擦音演化趋势为:tʃ>ɬs/ɬ、ʔj>dz/dz,ɿ。(见《文山壮语丘北土语浪砚话塞擦音研究》一文,云南民族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杨正瑛发现高麻壮语不送气声母p、t、tɕ、k、

pj、pw可以读为送气声母;残存的清鼻音m,仅有ma¹“来”、ma²“狗”、mu¹“猪”三个词,送气特征已经不明显;原始侗台语的*ʔb、*ʔd在高麻壮语中发生了语音演变,ʔb音变为w,ʔd音变为lɿ。(见《高麻壮语音变研究》一文,载于《铜仁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李锦芳和卢奋长发现桂北地区一些壮语点存在浊鼻、边音和清鼻、边音对立等现象,认为这是存古现象,目前正趋向消失,其演变过程为先经历变为先喉塞鼻、边音的阶段,后并入浊鼻音和浊边音。(见《桂北壮语清鼻音和清边音来源与演变》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24年第2期)

2.在声母的来源方面

杨芬提出了龙岗壮语腭化音声母来源于对应的古浊音声母、带先喉塞成分的清声类声母和带流音的复辅音声母三方面观点。(见《龙岗壮语腭化音声母探源》一文,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3年第3期)

杨红艳认为南壮与北壮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北壮之所以没有送气音声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地域的制约。壮语南部方言在壮汉双语融合的过程中,南壮能吸收、借用汉语的送气音p、t、k,但是北壮却没有使用送气音,而是把p、t、k念成相应的b、d、g。(见《广西壮语南部方言送气音研究》一文,载于《才智》2017年第23期)

赵先进发现浪砚话塞擦音是多源的,它主要来源于复辅音kl、腭化音声母kj和ki以及带喉塞音ʔj。(见《文山壮语丘北土语浪砚话塞擦音研究》一文,云南民族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3.在声母的特征方面

韦景云归纳出壮语流音*r共时特征有r和l、hl、ɸ、j、hj、ɣ、z、ð、θ等,认为其特征分布应与壮汉语言密切接触有关:壮语的r特征是旧语,而l、hl、ɸ、j、hj、ɣ、z、ð、θ特征是新语。(见《语言接触视域下壮语流音*r的特征分布》一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张霞总结出高寨话浊擦音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高寨话浊擦音类型有唇齿浊擦音v、齿间浊擦音ð、舌面前浊擦音j和舌根浊擦音ɣ;二是高寨话四个浊擦音声母例词中,e声母例词最多,j声母例词最少;三是高寨话v、ð、ɣ声母例词分布于八个调类,第二调的例词数最多,j声母例词没有第五、七和八调,第一调例词最多。(见《文山壮语高寨话浊擦音研究》一文,云南民族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郝鹏飞认为,壮语方言闭塞音在系列数上以两分格局为主,在发音部位上都采用双唇、齿龈、软腭、喉四个发音部位,伴随的次要调音部位类型分别是圆唇化、腭化以及极少的软腭化。(见《壮语辅音中闭塞音的类型学特征》一文,载于《贺州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肖锦燕总结出壮语方言在世界语言中属于中小型语言,壮语方言的塞音系统可以概括为“双唇+齿龈+软腭”,大部分壮语方言有塞擦音,壮语方言有清化鼻音,所有的壮语方言都有清擦音f和h、边音l及近音,壮语方言音系的颤音和闪音不构成对立关系,浊内爆音是壮语方言里很常见的音位,壮语方言音系一共出现了33个唇化辅音,极少数方言没有唇化辅音,壮语方言共有8个复辅音等普遍共性。(见《壮语辅音的地理类型研究》一文,广西民族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

黄芳慧根据大黄话内爆音的声学语图表现及听感判断,认为大黄话内爆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弱化的原因既有外部的语言接触的影响,也有发声方式的变化、听感等内部原因引。(见《壮语红水河土语大黄话内爆音研究》一文,云南民族大学2023年硕士学位论文)

二、韵母的研究

韵母的研究集中在元音、韵尾和特定韵母的研究三个方面:

1.在元音的研究方面

蓝利国发现壮语元音系统有六、七、八、九、十元音型五种类型,其中七元音型和八元音型最多;元音系统几乎都属于三角形,只有文麻土语黑末话的元音系统是矩形;壮语元音音位的平均数目是7.6个,较元音音位平均数目为8.7个的普

遍共性要少;50个方言点的元音系统共出现14个元音音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i e a o u/,其次是/w ə ɔ ɛ y/。认为/w/的高频出现是壮语元音的一个明显类型特征。(见《壮语元音系统的类型学特征》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3年第2期)

韦景云认为原始台语塞音韵尾-k趋于消失,这种变异特征应是地缘及语言内部演变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见《板田壮语几个音变特征及其演化路径》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5年第5期)

王碧玉、牟成刚和韦名应确定文山壮语*a元音高化链移的音变路径为(*aʔi>)*a>ɑ>ʔ>o>u,音变的启动环节是从a开始的。(见《文山壮语*a元音高化链移》一文,载于《文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卢春归归纳出里呼壮语的中元音在音位特征(在发音时舌位处于中间位置,音色较为中性)、变体(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出不同的音质特征)、声学特征(里呼壮语的中元音在频谱上具有特定的共振峰模式)、历史演变(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音变,这些音变与语言接触、语音系统的内部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和语言功能(在区分词义、标记语法范畴等方面的重要的功能)等方面具有的独特的研究价值,为进一步研究壮语语音系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见《里呼壮语的中元音研究》一文,云南民族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卢奋长将港城壮语元音音变分成元音高化、元音低化、元音央化、元音前化、元音复化共五种类型;并从港城壮语中的汉语借词与周边粤方言以及多地壮语点的对比,找到港城壮语元音演变的外因;从元音的自身音质属性和语音系统内部的调整,找到港城壮语元音音变的内因。(见《港城壮语元音音变类型研究》一文,广西民族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张亚总结出纳思话长短元音的类型有a-和o-两种,其中a-的对立最为丰富而整齐;纳思话和文山壮语其他土语长短元音分布的共同特点与地理远近及方言土语的分化没有关系;纳思话的长短元音,主要由时长的长短来区分,长a和长o的舌位偏低,短a的舌位偏高,短o的舌位偏央。(见《文山壮语纳思话长短元音研究》一文,云南民族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

2.在韵尾的研究方面

韦景云和梁敢发现阳朔鹤岭壮语的-m尾易发生-m>-ŋ音变,-n尾则出现-n>-m、-ŋ、-t不规则音变;-p尾大部分发生-p>-k、小部分则发生-p>-t音变,而-t和-k尾的少部分字也有些互变。其中,最为突出的音变是-m>-ŋ和-p>-k两组尾音。(见《阳朔鹤岭壮话韵尾的创新》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3年第1期)

王玉周和杨露发现文山壮语未牙话保留塞音韵尾-p、-t、-k,其中韵尾-t最保守,仍完整保留,-p大部分保留,有个别变成-t,而长元音后的-k尾已全部弱化为喉塞音-ʔ,短元音后的-k仍有保留。认为未牙话塞音韵尾的弱化,一方面是语言自身发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语言接触使然,与汉语方言的影响密切相关。(见《文山壮语未牙话塞音韵尾演变研究》一文,载于《文山学院学报》第3期)

3.在特定韵母的研究方面

韦景云认为广西永福古座壮语有成系统的鼻化韵ã、ẽ、õ,其鼻化韵大都是阳声韵-m、-n、-ŋ及入声韵-p、-t、-k弱化、脱落的结果,其来源应与当地汉语方言的接触、影响有关。(见《永福古座壮语鼻化韵特点及其成因》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7年第3期)

蒙元耀和梁生发现壮语民族固有词里有不少以-aw韵构成的字,借自汉语也有不少字读-aw韵,-aw韵之中有不少字跟汉语有明显对应。认为这种对应展示了壮汉语之间不仅拥有古老的渊源关系,同时也显示了两种语言在历史过程中有密切的联系。(见《壮语-aw韵字研究》一文,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

黄静露认为广西中南部壮语读书音鱼虞韵是一种具有特殊发音特点的古老音节,其读音主要包括[i][ei][o][u]等韵母,反映了壮语语音特点及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鱼虞韵读音的来源:一是语言之间的外在接触,二是语音自身发展。(见《广西中南部壮语读书音鱼虞韵的读音

及类型》一文,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何仙发现同应壮语后滑音ə的来源及演变极为复杂,其中wə是由原始台语的wu演变而来,iə是由iə和ie演变而来,uə则是由iə和ue演变而来的。认为后滑音是桂边土语语音演变的重要特征,反映了壮语音系的历史发展。(见《壮语桂边土语同应话后滑音研究》一文,云南民族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

杨正瑛发现高麻壮语塞音尾-k完全消失。(见《高麻壮语音变研究》一文,载于《铜仁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三、声调的研究

声调的研究集中在声调的起源、合并及分化,调变规律,标调方法四方面:

1.在声调的起源方面

黄玉雄发现以广西龙州话为代表的壮语部分南部方言的第4调伴随喉塞成分,颇为特殊。他认为,降调与喉塞成分有着密切关系,喉塞韵尾可能是促使这种声调形成的原因。但是,音高的范畴化可能是若干制约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壮侗语族语言第3调、第4调起源于喉塞韵尾的假说有待于进一步精密和完善。(见《壮语南部方言第4调的声学表现与共时比较:兼评与侗台语研究有关的声调起源理论》一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2.在声调的合并、分化方面

王文敏和吕嵩崧通过对靖西壮语的单字调进行实验语音分析,提出靖西壮语的第3声调值应为44;第4声和第6声可能趋于合并;第5声是一个两折调,前段略凹后段为凸起的拱弧。进一步的辨认实验证明靖西壮语的第4声和第6声已经合并。(见《靖西壮语单字调感知研究》一文,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贾淑凤将文山壮语阴调类再分化分为由I类声母(ʔ、ʔb、ʔd等)影响而引起的阴调类再分化、由III类声母(ph、th、kh等)等送气清塞音或者清塞擦音声母影响而产生的阴调类再分化和由I类声母(ʔ、ʔb、ʔd等)和III类声母(ph、th、kh等)的影响而引起的阴调类再分化三种类型,认为文山壮语阴调类再分化音节的声调原来是带假声的超高调,由于其声母辅音的发声态和声门气压发生了变化,并且影响到整个音节起音以及声调目标的实现,才致使声调产生二次分化。(见《文山壮语阴调类二次分化研究》一文,云南民族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黄玉雄认为壮语南部方言B类声调的分化与声母清浊、声母松紧、送气与否密切相关,其中B类声调的第3调与张声相关,第4调与驰声相关,发声态变化是B类声调分化、分流或合流的主要动因。并认为声母清浊一直主导壮语南部方言声调系统的演化格局。(见《壮语龙州话、宁明话B类声调的分化条件》一文,载于《河池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韦名应认为邕宁、扶绥、隆安、德保壮语的I类声母(ʔ、ʔb、ʔd)和III类声母(ph、th、kh、tsh)音节发生了阴调类再分化,其原因在于声母辅音的气化或僵化,影响到原先(假声超)高调目标的实现,音高明显降低,调形改变,进而产生声调分派。(见《邕宁等壮语阴调类再分化的原因》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7年第1期)

覃玉彩通过声学分析,总结出武宣古杭壮语共有六个舒声调和两个促声调,与汉语的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八个调类相当。舒声调每个调类只有一个调值,促声调则因元音长短的不同,每个调类又分化为两个调。(见《广西武宣古杭壮语声调实验分析》一文,载于《钦州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谭文祯发现富宁壮语中以内爆音ʔb、ʔd和ʔ为声母的音节,原本应属于第一调的词产生分化并与第六调合流,第七短调与第八短调合流。认为产生分化的原因在于内爆音声母的发声态和声门气压发生了变化。(见《富宁壮语的内爆音》一文,载于《文山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杨正瑛发现高麻壮语塞音尾-k脱落后声调并入第2调和第4调。(见《高麻壮语音变研究》一文,载于《铜仁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未完待续)